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指导思想

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刘金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这一深刻阐述和精辟论断是对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们党不断开创伟大事业新局面成功秘诀的理论升华,更为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确立了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吸纳和批判继承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科学预测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特别是经典作家通过发现和阐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通过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由空想转化为现实,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世界文明的卓越成果和“人类精神的精华”,是无产阶级政党改造社会、造福大众的“定盘星”和“指南针”,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引擎和巨大精神动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分析和准确把握党情国情世情,及时回应和有效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明时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党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纲领。百年党史充分印证,只有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不渝地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中国改革开放才能气势如虹、基业长青、前景璀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要获得更快发展实现更大进步,须臾离不开人类充分调动和激发自身的“革命”、“改革”因素,“能动”地破除陈旧思维的束缚和僵化体制的羁绊,主动地顺应客观规律的基本要求和时代发展的浩荡潮流。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政治勇气和高超政治智慧,坚定不移地把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推向深入,坚持不懈地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变革”因素,自觉地运用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不断聚焦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既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又实事求是、善作善成,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形象大幅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和有效实践,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中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等哲学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将神奇的精神瑰宝转变为巨大的物质财富。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社会呈现和昭示给世人的,一方面是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陆续爆发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确立,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和其思想理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乏力与失效。但资本主义营垒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政客和学者,坚持单向一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无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客观事实,回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剧的贫富差别、阶级对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突出问题,大肆鼓噪资本主义制度无可替代的神话与不可战胜的赞歌,极力为西式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进行张目,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处于低潮而资本主义呈现上升之时,这种理论狂妄和思想猖獗急剧发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显现出对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漠视和排斥。反对和贬抑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全部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和历史观的逻辑基础,他们的思想观念不仅充斥着阶级私利的本能欲望和强权政治的主观意图,而且弥漫着西方意识形态的雾霾和普世价值的烟尘,这种思想观念通过西方国家宣传机器的宣扬和推介,成为后来某些国家工人运动和

政治体制“向右转”的外在诱因,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说,这些思想好像纳发从丘比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原原本本或者改头换面地从资产阶级的报刊搬到社会主义的报刊,尽管一生下来就非常完备,但也深深地打上反唯物辩证法的烙印。

具有批判作用和革命功能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思想方法论。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唯物辩证法的灵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党的思想路线,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性胜利,这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和理论精英们惊慌失措甚至心惊胆寒。早在1958年,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大声惊呼:“如果我们不了解共产党的政治和经济攻势,或者了解了而又不采取有效行动来对付的话,就会使自由的范围逐步缩小,一直被推回到我们自己的海岸,而我们可能还有几个盟国将成为只不过是包围在一片红色海洋中的一个孤岛而已。”1960年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国演讲中慨叹:“共产党过去是现在还是比我们自己的力量发展得更快,我所说的共产党的力量是指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科学和教育力量以及政治力量”,因此“时间并不是我们的朋友”。自1978年迄今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继续恪守以矛盾分析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努力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将破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主要依据和重要目标,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业绩和史所罕见的成就,这再度引发了当代西方政客和学者的极度恐慌和深切畏惧,他们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失时机地表达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霸权地位的想法和愿望。1999年美国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和共和党国会对外政策顾问爱德华·廷珀莱克在合写的《红龙跃起》一书中声称“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遏制”。2018年1月,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中国

对美国企业和经济都构成威胁,中情局的作用就是确保我们的决策者了解中国的挑战,以便他们作出选择反击威胁。”2018年4月,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办公室助理希思·塔博特向彭博社确认,为了减少给国家安全造成相当负面的后果,美国考虑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禁止中国企业投资半导体和5G无线通信等行业。由此不难看出,违背唯物辩证法基本逻辑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已经成为彼时美国政经学三界人士的根本立场,压制中国发展和遏制中国崛起,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朝野上下颇有市场。

曾几何时,东欧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共产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一重要思想武器,对本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视而不见,对本国政治经济的内在困境充耳不闻,脱离国情党情游离时代趋势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最终丧失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西方政客和理论精英们为此弹冠相庆、兴奋异常,迫不及待地宣布社会主义即将整体灭亡,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逐步普及全球,前有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撰写专著《大失败》,浓墨重彩地描绘“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光明前景;后有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直截了当地宣布西方自由主义已经不战而胜。局促如此,短视如此,浅薄如此,在人类社会发展新旧事物交锋的一个回合中,在浩荡奔涌历史长河的一个峡谷里,引发了一场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大肆进行制度吹嘘和意识形态炫耀比赛的闹剧,这固然显得有些滑稽和荒唐,但却成为一种测试剂和检测仪,勘测出资本主义极右政客和思想精英们虚妄的判断水准和粗俗的认知能力。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曾推断20世纪后半叶是社会主义走向衰落的历史阶段,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将不复存在,布热津斯基曾非常自信地预言:“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状况有任何关系”,这就是其名噪一时的历史“大趋势”。这些论者在发表上述论调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漠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中确立下来并且为很多国家所接受,这绝非个别人主观意愿的产物,更不是历史的偶然性结果,其根基深植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中。当年支撑布

热津斯基和福山等人观点的主要现实依据,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的个案和特例,这种个案和特例表明,西方资产阶级利用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管控的手段和策略来调节某些社会关系、延缓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得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重大进步。把资本主义制度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相对稳定加以绝对化、神圣化和理想化,“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片面地、夸大地、过分地发展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列宁《哲学笔记》),这无疑是他们认识论和思想方法的重要基石。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证明不了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摆脱和超越了与生俱来的始终纠缠自己的社会基本矛盾,恰恰相反,在这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不协调的基本矛盾的驱动下,“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马克思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扼杀和欺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贫富两极分化和其他种种带有根本性质的社会病症,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保护神,因为科技发展只是事物的表象,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社会后果才是事物的本质。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看来,科学技术是历史进步的有力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动力源泉,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科技进步归根结底推动着原有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完善,继之而来的则是新的科技革命引发的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指导思想,始终不渝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判社会发展阶段、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厘清社会问题成因,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才能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有所作为。要深入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熟练掌握和自如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和统领改革开放,做到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努力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洞察力、擎击力、预见性和指向性。

提高辩证思维能力 进行伟大斗争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徐广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历来就非常重视学习辩证唯物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运用辩证唯物论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入新时期后,面对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在进行伟大斗争,提高治国理政能力时,必须强化辩证思维,提高辩证思维能力,而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学习辩证唯物论,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

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主要对象就是矛盾,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去思考矛盾,首先要突出问题导向。问题就是矛盾,人类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期,正确地认识到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这是我们制定政策的正确起点和相关工作的着力点。这些都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和贯彻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和强化战略思维,抓住主要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底色。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之中既包括同一性也包括斗争性,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斗争性是矛盾的重要方面,而且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后者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重视斗争的作用,强调发扬斗争精神,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这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特征。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其中绝大多数斗争都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而顺利解决这些矛盾都离不开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方法的准确领会和坚决贯彻。在新时期的复杂情况下,党员特别是处在领导岗位上的党员的思维水平的高低关系到我们能否准确分析各项风险挑战,能否制定正确的对策,能否使用正确的斗争方法。

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凭的是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凭的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强大精神。

在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提高思维水平,进行伟大斗争过程中,我们要特别强化思维方法的宏观性、前瞻性和策略性维度,锤炼我们的斗争技巧。首先,坚持问题导向和危机意识。我们一定要心怀“国之大者”,学会从“总问题”和主要矛盾出发思考“子问题”和次要矛盾。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危”与“机”的辩证法,以宏观视角关注微观问题,在更高层次推进矛盾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其次,学会见微知著和“治未病”。提高防范化解风险能力,防患于未然,在防范危险的同时主动作为,不拖沓,不推诿,在工作中学会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最终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最后,制定合理策略,灵活进行斗争。抓住主要矛盾,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能的积极因素,促进矛盾双方的转化,解决面临的问题,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与理论创新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 马丹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的良性互动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取得百年辉煌成就的密钥,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使中华文明实现了实质性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伟大革命”,在人类文明史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前后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界的面貌,这对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来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在中华文明史上实现了深刻的变革。

1840年鸦片战争后,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陷入了西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苦难深渊。近代中国面临巨大的社会危机和文明危机,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从西方引进近代资产阶级理论,但不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历史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要真正发挥这一指导作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同时,还必须批判地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创造性地转化中华文明,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中国,包括中华文明的面貌。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使中华文明实现了深刻变革,提升为一个新水平;另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在表现形式上也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色。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及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他在1930年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

义。”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而教条主义总是脱离具体实际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他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但就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又与从西方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有显著的区别,带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点或特性。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精髓,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包括中华文明的融合达到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也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从“今胜于古”到唯物史观。中国古代思想

家“今胜于古”的历史进化观念,也有革故鼎新的社会变革理论,并且对社会变化的动因和主体力量及发展规律也进行了探讨,已有若干与唯物史观契合的思想因素。但总体上说,中国传统历史观是非科学的,不可能真正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批判地继承了传统历史观中的积极因素,正确地说明了中国近代社会落后的原因和社会矛盾,开创了国历史的崭新局面。

从民本思想到人民主体地位。“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华文明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发端于商周时代,战国时期的孟子发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宣言,充分肯定了民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唯物史观之后,对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实现了批判性超越,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特别是民本思想所强调的“贵民”思想,使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奠定在中国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历史传统之上,将民本思想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观点,确立了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至上的原则。